



1977年恢复高考，我成了南京大学77级的学生。30岁才上大学的我，与扬长避短相悖，念了只适合年轻人念的数学。本科毕业后我被公派出国读博，回国后在母校南京大学任教，够了年头也当了教授、博导。时值恢复高考40年，想起高考前后的一些事，我很想把一些感受写下来，献给当年那些曾经为我操心、给我帮助、寄我希望的人们。

1948年7月，母亲在无锡农村的一个祠堂的偏房里生下了我。我们村是个相对独立的自然村，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500多个家庭。6岁刚过的我上了村里大约容纳300名学生的完小，那是所不错的小学，校友中出过官至中将的黄埔生，创办这个小学的是他的老父亲。我们小学校长的家也安在我们村上，他是一个把学生当成自己孩子一样爱护的读书人，在全村最受尊敬。记得校长教过我语文、美术和珠算。小学同班大约50个同学。

1960年我小学毕业，我的同班同学中有13人考取了初中。我的初中堰桥中学的前身是参加孙中山“兴中会”的胡雨人（1867-1928）及其兄胡壹修（1865-1931）创办的“胡氏公学”，已经有了超过100年的历史，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。胡壹修先生的三个儿子胡敦复（1886-1978）、胡明复（1891-1927）和胡刚复（1892-1966）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都有相当地位。胡敦复在康乃尔大学主修数学，毕业后回国服务，他担任过清华大学教务长，是上海大同大学的创办人，中国数学会创办的时候他是董事会主席（用现在的话说他就是中国数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的理事长），1925年还曾被任命为南京大学的前身东南大学校长。胡明复、胡刚复则都是哈佛博士，一个念了数学，一个念了物理，他们学成了也都回国服务。胡明复是现代中国在美获得数学博士的第一人，1927年夏天他返乡参加婶母的葬礼，傍晚天气闷热下河游泳消暑，36岁的他却不

¹ 本文2018年春完稿于南方科技大学，部分材料取自作者2007年未经发表的回忆记录。



四十多年后与几位高中老同学一起看望 95 岁的薛潮老师，2009 年

幸溺水身亡。胡刚复则是中国物理学会的第一届理事长，当过南京大学的前身南高师的物理系主任、浙江大学的理学院院长。这已故的“三胡”是姜伯驹先生（中科院院士、北京大学教授）的舅舅。

初中阶段适逢“三年自然灾害”，流失了不少学生，饿着肚子坚持读完的不到三分之二。在读了一所好的初中以后，1963 年我从无锡县考上了当年省里的 18 所示范中学之一的江苏省南菁高中，开始到江阴城里读书。南菁中学是一所走出过国家副总理和十多位院士的学校。我从小学到高中读的都是当年不错的学校，在班上年龄最小而又能考试，因此深得老师们的喜欢。我在南菁高一年级时的林姓副班长几年前还提起，当我的眼睛近视以后，为了不影响我的学习，是学校出的钱为我配的眼镜（应该是学校对我的好和家里条件差双重原因）。这件他人还记得的轶事，我也记录在此。

趁当事人大多健在，说一下我为什么在学校只参加了半年多的文化大革命。被学校和老师们厚爱的我，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对“造反派”打倒校领导、批斗老师有点抵触。让我决定站出来抗争的，是我的一位数学恩师——薛潮老师的遭遇。薛老师比我母亲还年岁大一些，复旦数学系肄业，教我们高三的解析几何。1966 年 6 月初，毕业考试结束，地主家庭出身的她大概预感到自己不再有上讲台的机会，于是把她心爱的由俄文翻译的教学参考书送给了我（那时参考书很少），我爱不释手。不久，亲见薛老师遭批斗，对我而言，犹如目睹母亲受辱。我成为学校里和“造反派”对立的“保皇派”学生组织的一号头目，还是有点莫名其妙。保皇派头头这个“桂冠”本不该轮到我，因为文化大革命之前，我只是高三年级六个班中一个班的团支部委员。是因为成绩好，有人跟我走？还是互掐中我针对性的大字报写的不错？1966 年 10 月作为学生代表到北京串联之后，看到国家主席都能被打倒，就知道自己“错”了，从此偃旗息鼓。等队伍解散的差不多，我就溜回家种田了。

造反派得势之后，作为战果，要整几个“反动学生”，我必须是其中的一个。



1966年夏天读完高三



作者在母校堰桥中学参观校史室，2008年

本来已经在离校 20 多公里老家种地的我被押解回学校，关在一个窗户有钢棚的办公室，睡（有地板的）地铺。我成了待宰的羔羊，虽然提心吊胆，但皮肉没有受苦。所幸“造反派”很快分裂成两派，打斗愈演愈烈，以致无暇顾及我。机会来了，在一些朋友的帮助下，我侥幸逃脱，哪位同学偷偷送我，至今我还历历在目。三十多年后有同学问我为什么文革中没有站错队，我说自己根本没有什么天生正确，只会随波逐流。文化大革命开头当“保皇派”，完全是念着校长和老师对我的好。后来“识了时务”，我也就老老实实回家种田算了。

文化大革命中学生的这一派，那一派，其实都是被愚弄的受害派。只是，文化大革命中的这段表现，让我日后见了老师，只用说感谢，无须说“SORRY”！

我回到家，因为没有自己的房子，条件格外差一些。上世纪三十年代祖父母带着父亲和叔叔从苏北移居无锡农村。到解放，他们是买了几亩田，但一家八口人住的不到 40 平米的房子，还是向人家典的。“典”是住户出大概房价一半的一笔钱给房主，就不用再出租租，但过了约定期限房主随时可以同样花那笔钱将房子赎回。爷爷那个先买地后置房的方针，加上后来人民公社、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折腾，让我们家几十年没有摆脱住房困境。到了我从学校回家的那年头，房子随时都有被赎回的可能。父母原本把希望寄托在念书一个比一个好的儿子们身上，现实却是送到城里读完高中的老大转了一圈又回到村上，年过十八才开始学种地。本已困难的家境再加上“投资”的失败，父母就不让读完初中小学的老二老三再继续念书了，我的两个弟弟从此辍学，这是对我家最大的伤害。

1967 是我回乡务农的第一年，升学无望的我，把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多余的精力，都放在家里一人一分的自留地。那年我种了一批白菜，园艺化的精心栽培，每棵都长成 10 斤左右。恰逢那年冬天大雪，城里蔬菜奇缺，就和村里的几个年轻人合伙用船把自家的白菜运到 16 公里外的无锡城里，沿街叫卖。记忆中，没有城管的驱赶和为难。船歇在城里闹猛的“惠农桥”，用现在的话说，是因为那里人流量大。去城里卖菜，吃饭，就在船头支个“行灶”烧；睡觉，就挤在水泥船仓里，裹一条粗布棉花胎，御寒主要靠再盖上严严实实的稻草。如果运气好，